

論路遙《平凡的世界》的女性主體性 ——一種鄉土中國本土現代性的解讀

黃文倩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學科約聘專任講師

提 要

《平凡的世界》（三部曲，1988年），是大陸當代的重要作家路遙（1949-1992）的代表作。本文以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形象及女性觀為考察角度，以農村知識女性與農婦的代表，分析她們不同於西方、不同於五四時期，亦不同於新中國建國後上山下鄉的女性主體的流變與特色。

女性主體性作為現代性實踐的一種，在《平凡的世界》中展現了另一條更為貼近土地，實事求是地跟中國鄉土／現實同在的擔當，並以情感的熱烈、明朗與堅強的形象流變，展現了女性在大陸改革開放的歷史社會的巨變中，仍有著母者般的彈性與穩重的氣象——在此作中，這也是她們邁向現代社會中，或自覺或自然的一種實踐與選擇，非傳統意義上的「逆來順受」。因此，在這層意義上，她們克服了過往歷史中突出的女性閨秀、膽怯、感傷、純情及個人主義的自我路線，也不以與男性相對立來彰顯其解放，兩性之間更多的是合乎現實的扶持與互補之愛，是鄉土中國本土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路遙 平凡的世界 女性 農村 現實主義

論路遙《平凡的世界》的女性主體性 ——一種鄉土中國本土現代性的解讀

黃文倩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學科約聘專任講師

一、前言：《平凡的世界》的重要性

儘管每部文學作品都有它的存在價值，但並不是每個作家、每部作品都有研究的必要與重要性。路遙^①（1949-1992）和他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值得介紹進台灣，同時應該受到學術界更多的關注，我認為有以下幾點重要性必須先被認知：

第一，就其出生的特質來說：路遙生於中國底層農村——陝西榆林，七歲時過繼給伯父並移居陝西延川，後畢業於具有共產黨革命起源地的延安大學。《平凡的世界》（1988 年左右完成）是他在農村完成的代表作。與一般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作家，及建國後上山下鄉作家中的鄉土經驗不同，路遙有著更為底層的鄉土中國經驗，也是在以基層實力起家的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歷史背景下，成長與發展起來的作家，文化大革命間，路遙曾累官到接近今日副縣長的職位。他對中國共產革命之於鄉土／底層／農村農民的解放與發展意義，親身經歷與遭遇的歷史困頓、上昇與轉型之路，均有相當深刻的歷史認識與主體經驗，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也就有不同於一般菁英作家的寫作／美學方式^②。

① 有關於路遙的生平，大陸方面已有許多專書完整介紹，可參見本文最後的參考文獻。

② 本文中的所謂「美學」，並不僅僅是藝術和技術上的假設，而是包含文學對社會上的其它階層的解放功能與效果等的可能性。

第二，就其長篇小說的底層思想與美學，具有二十世紀兩岸文學史上的特殊性與在台灣再開發解讀的必要性來說：洪子誠曾在其《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指出，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的文學發展，跟當時的文學獎的評審與文化權力的重新分配密切相關，有兩大傾向：一是以人民日報文學獎系統的「歸來」／「右派」世代作家，到了八五年以後，就是「知青」世代作家，這一類的作品，以短篇及中篇為主。二是茅盾文學獎系統的長篇小說的作家^③，其作家的年齡層，大約接近「知青」世代作家，但跟「知青」世代作家不同的是，茅盾文學獎得獎的作家及其作品，如路遙及其《平凡的世界》，他們的出身更為基層，既自中國底層農村的生活下長大，相對於「右派」及「知青」等作家，對中國農村艱困的生活與蓬勃的鄉野性格、生命力、以及面對社會歷史轉型的困難與矛盾，也較有其豐富的經驗與理解。然而，由於1978年以後改革開放的文化領導權，再次轉向知識分子的手上，因此路遙其人及其作品，在目前的文學史定位和研究上，似乎也難以跟同期的「知青」世代作家並比，再加上台灣目前也沒有學者研究路遙及其作品，是故無論就材料的詮釋和文學史定位，在台灣再開發再解讀，均還有空間。

第三，就擴充二十世紀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心態史的參照系來說：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的文學學術界，馬克思主義的視野與問題意識，早已經不是禁忌，但由於長期較為重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以及近十餘年台灣文學研究蔚為顯學的關係，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心態史，多少仍然比較侷限於都市、中上層，或所謂文人／名士傾向的作家作品研究，這樣的現象當然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例如早年能夠擁有書寫權的作家，確實經濟條件都「相對」較好，即使不完全都有具備上層的家世，至少很少是底層出身，不用完全被生活壓力壓制而磨損了創作與才能的發展；而亦同屬於較中上層的「易代之際」的知識分子作家研究，亦能夠作為不同階段也有類似「易代」狀況的相關研究的對照（例如如果將「易代」理解成某種政權或歷史時代的轉型點，那麼歷史上相關的「易代」研究，亦可作為台灣現代也具有「易代」的歷史時刻，如

③ 此方面的論述，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87-192。

冷戰結束、日治時期結束、國民黨來台後等的相關社會狀態、心態史等研究的參照）。但無論如何，以目前台灣在此方面的出版現象或研究的關注來說，仍未能納入中國共產黨崛起以降，所發展出來以底層出身為背景的作家作品研究，對二十世紀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的參照系也就仍有明顯缺漏，也因此有極待補充的必要。

第四，就所研究對象的地理及其文化語境的重要性來說：路遙所出生的陝西，地處中國內陸，不同於上海及北京，其境內的西安，乃為中國古代許多朝代的古都，文化歷史深厚。就現當代的文化淵源來說，其省內的延安，更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崛起及紅軍長征的起點，因此生長在此地的作家路遙，相對於北京、上海的知識分子，更為貼近這種紅色路線與最初的理想主義式的社會主義精神，再加上其地的農村生活條件更為艱苦，也養成與發展出不同於上海及北京的文化人格，具有相對更為剛毅與氣魄的風格。以今日上海及北京作家被普遍開發及研究的狀況下，若能將同一歷史階段的陝西作家、作品的特質、思想、社會與歷史內涵重構出來，將能更有效的跟其它省份的作家進行參照研究，日後才有可能分析各地區（如不同省份）的文學相對特質，奠定更為紮實的比較視野與基礎。

第五，就體例、創作的功能及涉及的思想、淵源、社會、歷史的幅度來說，新中國建國後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研究，目前也仍未得到台灣人文學界的重視。一般來說，現實主義小說（廣義的）由於要反映社會現實的方方面面、人事糾葛，其實需要長篇的篇幅才較有可能處理好。國內外的現實主義文學淵源也說明了這一點，例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湯達的《紅與黑》等都是長篇，五四時期的茅盾、巴金的代表作也是長篇。路遙的代表作亦是長篇，早年均深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以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寫作方式的引導，但又在改革開放後，大量地吸收批判現實主義和1985年後中西文化大量交融下的創新寫作技術^④，因此《平凡的

④ 路遙的現實主義創作觀與創作實踐，雖然受到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中國古典白話小說，以及八〇年代中大陸重新大量引進西方各式「現代」技法的影響，但他更有自覺地想實踐與建構一種不同於西方，更具有中國鄉土社會特質的創作，這方面的創作自

世界》（三部曲，獲 1991 年的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大幅度的承載了新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農村、農民的生活狀況、政治、社會、對農村農民的影響等，以路遙為個案，相對於「右派」和「知青」世代的作家及作品，更能聯繫上新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人口的具體生活、風俗畫（社會的及個人的）和思想狀況，同時透過這種具體的分析，也將能夠讓台灣的人文與社會學界，理解更多面的中國大陸，更為貼近他們曾有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想精神，是清理第三世界^⑤本土現代性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六，就對二十一世紀新世代仍有影響力來說：八〇年代末，當路遙還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時，當地媒體就已經將其製作成廣播劇，廣泛地散播到中國農村及城市各地。1989 年則更進一步改拍成 14 集連續劇，而在新世紀後，據說也仍準備再重新改拍成 30 集連續劇。此外，筆者在跟一些大陸學者討論路遙時，時常聽到的一種說法

白，可參見其長篇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 年），當中比較重要相關內容，如談及文學淵源，可見《早》書頁 42：「我並不排斥現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閱讀和思考現實主義以外的各種流派。其間許多大師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於陀斯陀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開始直至歐美及偉大的拉丁美洲當代文學之中，他們都極其深刻地影響了我。當然，我承認，眼下，也許列夫·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司湯達、曹雪芹等現實主義大師對我的影響要更深一些」；談及對中國大陸八〇年代現代派的反思，亦如前書頁 42 中曾言：「當時我國出現的為數並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都處於直接借鑒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現代派作品的水平，顯然談不到成熟，更談不到標新立異。……從中國和世界文學史的角度觀察，文學形式的變革和人類生活自身的變革一樣，是經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實驗的失敗，也無可非議」；談及如何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實主義時，如前書頁 44：「只有在我們民族偉大歷史文化的土壤上產生出真正具有我們自己特性的新文學成果，並讓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時候，我們的現代表現形式的作品也許才會趨向成熟。……我們需要借鑒一切優秀的域外文學以更好地發展我們民族的新文學。」

- ⑤ 「第三世界」是二十世紀冷戰結構以降的觀念產物，一般來說有兩種認知方式，一種指的是在冷戰時期，政治上相對中立，同時經濟上較為弱勢的國家，亞洲地區自然在內；另一種則是由毛澤東在七〇年代初期所提出的觀念，他認為第一世界是美、蘇這兩個稱霸世界的超級強權，而第二世界則是擁有較強經濟實力的工業化國家，第三世界則是外於前二者的國家，毛這樣的理念主要是想實踐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中國都應該有不同於其它第一、二世界國家的道路，中國的發展自有其主體性。詳細資訊可參閱網路維基百科：「第三世界」，本文對第三世界的使用及假設，乃是參考了毛澤東的觀念。

是，當今中國農村出來城市考試讀書的年輕人，路遙是他們在文學應試時最常提及的作家，可見雖然台灣目前對路遙幾乎無所問津，但路遙對中國大陸的下一代仍然有相當的影響力，這種現象本身就非常耐人尋味，代表路遙的思想與美學力量，仍跟新世代的精神結構有某種隱性的連結，實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性。

二、文獻檢討及本文問題意識的導出

台灣學界對路遙非常不熟悉，目前沒有相關的研究結果。而在中國大陸方面，與《平凡的世界》直接相關的重要研究評析與成果，收錄在以下幾本專書內，包括：《路遙研究資料》、《路遙評傳》、《路遙再解讀》、《路遙評論集》及《路遙的小說世界》等，然而，本研究與過去前人研究的問題、視角／方法的差異，及將以何種方式與大陸學界現有成果對話呢？以下為相關的文獻檢討及本文問題意識的導出。

首先，本研究選擇重新解讀《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形象與女性觀，換句話說，就是女性主體性的問題。這方面的視角，在單篇論文的成果上，過去曾直接涉及且較具有代表性者為：丁紅梅、王聖〈男權思想統照下的女性世界—淺談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幾個女性形象〉，收錄在《路遙研究資料》，這篇文章先行假設了一個論述前提，認為《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已被「男權思想統照」，文中分析作品中的女性蘭花和田潤葉的愛情與婚姻關係時，便延伸出這樣的批評：

男權社會的門第觀念及男權思想中對男、女角色的規定，尤其是後者，社會習俗、傳統觀念早已規定好，一切的婚姻，應建立在男強女弱、男人主宰、女人附屬的模式上，一旦打破這個模式，整個社會以及整個的男人世界就無法接受，就要群起而攻之。^⑥

……男權思想統治……並不是隨著某種社會制度的消失就消亡了，它成為一種

⑥ 丁紅梅、王聖〈男權思想統照下的女性世界—淺談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幾個女性形象〉，《路遙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458。

深入社會以及每個人骨髓的思想觀念及種種行為規範，久久地統攝著社會生活及人們的思想意識。它作為傳統，維護著社會正常的秩序，形成一定的道德水準；但也因其性別的歧視，扼殺著女性的本性與權益。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女性意識的覺醒，女子的獨立與自尊，女性擺脫附屬地位而成為與男性一樣的社會的人，必將使人類社會更加文明、進步，也必將促進人類的昌明和發展。^⑦

但是，綜觀《平凡的世界》中的男女關係，雖然確實有男強女弱（至少在體能上）的事實，但她們的命運，並非全由男性所主宰，同時，小說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如蓮花、田潤葉等，無論在婚前婚後與男性的關係，亦全非「附屬」於男性，她們一直盡可能在實際的現實裡實踐與擴充生活的意義，尤有甚者，在小說中所設定的七〇年代中至八〇年代初期的鄉土中國條件下，她們更不可能有什麼被「男權思想統照」的想法。所以，上述的論斷，實有以今律古，過度闡釋的限制。

而在路遙研究的相關專書裡，亦有二本書有部分地討論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但是，他們的觀點也很接近丁文，例如閻慧玲在《路遙的小說世界》中批評：

女性身上主體意識卻仍然處於蒙昧狀態，這不僅反映了作家個體狹隘的性別歧視，而且揭示了整個文化傳統對女性主體意識的忽視、壓抑、冷漠。^⑧

王西平、李星、李國平合著的《路遙評傳》中，則在分析田潤葉時也說：

一個沒有擺脫舊的婚姻觀念的束縛但卻有著崇高美好心靈的傳統女性……到了七〇年代末，作為小學教師的田潤葉還有這種思想觀念，說明在我國封建主義的思想影響，特別是在愛情婚姻觀方面的影響還是相當嚴重的。她（他）們需要

⑦ 同上註，頁 461-462。

⑧ 閻慧玲《路遙的小說世界》（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年），頁 100。

當代意識的注入，以呼喚自我意識、個性意識的覺醒，使民族靈魂得到重鑄。⁹

諸如此類的種種說法，其實傾向性都很雷同，都是認為這些女性沒有自己的「主體性」，需要重新再解放、改造。然而，這些分析其實都已經假設了某種外於討論對象本身的標準（如前述言及的男權體制、某種時間的進化觀、她們是封建文化下的產物及結果等），都忽視了《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其實亦有能夠安頓她們自身與現實的方式和價值觀，在作者路遙筆下，她們被賦予了非常優美、善良的人格品質和形象，她們跟男性的關係，也絕非所謂的「性別歧視」一說所能簡單概括。

事實上，造成對《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的這種批評傾向，實可以再追溯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八〇年初的知識結構與感情結構，這方面的代表可以蔡翔的論著為例，蔡翔早年在評析路遙早期的代表作〈人生〉時，便認為當中的女性非常有問題，蔡翔說：

她不是通過他人來體現自己的價值，而只是希望由他人來實現自己的價值。這種褊狹的認識取代了她的全部自我意識。¹⁰

我們同情她的悲劇命運，贊美她的善良、純真、謙讓……但並不意味著肯定她的悲劇性格。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正是努力提高每個人的社會價值，每個人就應該珍惜和提高自己的價值，婦女對自身人格價值的尊重，決不能僅僅局限在愛情和婚姻的小圈子裡，而應該對生活有更積極的開拓，婦女要永遠保持自強自立的清醒意識，就要同傳統的觀念作徹底的決裂，要從小生產者的愚昧中解放出來。¹¹

⁹ 王西平、李星、李國平合著的《路遙評傳》（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101-102

¹⁰ 蔡翔〈高加林和劉巧珍〉（1982年），收入《路遙評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4月），頁7。

¹¹ 同上註，頁8。

蔡翔此文寫於 1982 年，很能代表八〇年代以降，中國知識界對女性主體的期望傾向，同時，這樣欲與傳統決裂，將立足農村者視為一種小生產者的觀看眼光，其實本質上亦存在著預設了一種「啓蒙」姿態和價值判斷上的封閉與靜態性。而就落實到蔡翔所選用的女性個案〈人生〉的巧珍的具體細節來說，其實巧珍實在沒有完全不懂自己的價值，她在作品中，雖然是一個單純的農村女性，她仍有她不同於知識分子、獨特的愛人和生活方式，她並沒有不立自強，事實上當她明白高加林因為有了更好的出路，要跟她分手時，她冷靜地接受了這個決定，同時也沒有任何報復的行為，甚至仍繼續投入下一段感情與婚姻，勇敢面對現實的人生，沒有因為一時感情受傷而耽溺以至自毀，甚至當昔日的對象高加林因為工作走後門被揭發，不得不回返農村後，巧珍也依然在能力範圍內，以其愛才惜才之心間接地想再幫忙他。這種人格特質可以說自有其「主體性」，值得我們進一步分析、理解其內涵，實不能以簡單的「落後」來理解她們。

也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擬從另一種角度出發，這種角度我稱之為：「鄉土中國本土現代性」，這是一個待建構的學術視野，故無法先行以簡單的觀念來「界定」，它必須透過考察大陸改革開放下，各式各樣實際的鄉土社會的材料以「歸納」出來，有別於外於材料的方法或西方理論來理解對象的謬誤。透過這種歷史和社會化來理解對象，才能擴充真正多元的現代性想像。故本個案的鄉土中國的女性主體性的討論，只是筆者未來長期企圖建構「鄉土中國本土現代性」的論述系統的一個有機部分，就方法論的性質來說，它們是一種相異於西方女性主義觀，具有中國鄉土女性文化人格的自我解放的特色闡釋。至於在具體技術面的操作上，本文在分析《平凡的世界》的女性主體性時，選擇的是具有分析價值的典型對象，而非「面面俱到」的條列式分析，在類型上，繼承一般常態的「知識女性」和「農婦」的類型，才能在同類型知識譜系的參照下，彰顯她們在鄉土中國下的形象流變與主體特質。

三、精神性與自覺的母性：《平凡的世界》中的知識女性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女性解放一直是一個重要命題。

無論是魯迅的〈傷逝〉中爭取自由戀愛、婚姻自主的子君、丁玲〈莎菲女士的日子〉中大膽坦露自我情慾與性格的莎菲，蕭紅〈小城三月〉中偶然發現人生有另外一種可能，但難以真正展開自我解放之傳統女性翠姨，甚至就書寫這些作品的作家生命狀態來說，他們也幾乎跟她們筆下的人物類似，都在時代轉型的裂變裡，企圖選擇一條從傳統封建社會出走的道路，這種人生道路無論從過去或今日來看，似乎叛逆前衛，但事實上仍充滿著各種變數、困境，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例如五四以降也有各個階段），都必須面對更為艱難的社會巨變（例如軍閥、例如抗日戰爭、例如國共內戰等）和生存問題，也因此，在中國女性解放的早期過程裡，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很有意思，但不難理解的現象—女性在解放與主體的發展裡，往往必須先仰賴男性與父權社會體制下的社會、權力結構與運作方式，也因此，五四以降的許多女作家與文學代表作（如上述的作品）中的女性，往往也是被男性所啓蒙的「對象」，所以〈傷逝〉中的子君跟男主人公涓生的戀愛細節，常常是建立在男性教導女性的姿態上；丁玲和蕭紅的人生發展，也常常是跟進許多男性在社會發展下的附帶產物，例如瞿秋白、胡風跟早期丁玲亦師亦友的互動；蕭紅之於蕭軍、端木蕻良依附的關係，甚至類比來說，這種女性發展與上昇的結構，在西方現實主義小說中，如《嘉莉妹妹》、如《法國中尉的女人》，甚至一些現當代知名女性的人物傳記，例如香奈兒等，都不難看見。在一定程度上，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或只要女性仍作為一個相對弱勢的主體，她們以依附男性與父權體制以求得在社會縫隙發展的機會，是一種儘管傳統衛道／保守人士所不屑，但仍相當普遍存在的歷史事實。

然而，在考察新中國建國以降的文學作品中的女性主體時，我發現了一些非常不同的女性生存與發展的另一種歷史現實：有許多女性，並不以依附男性及父權的社會結構來求得自己的上昇與發展之道，她們的勇於自我實現，雖早已超出中國傳統，但更多地常因應鄉土現實狀況進行節制；她們跟集體的關係也較為密切，對她／他者的付出（無論肉體、精神或物質）也很主動坦蕩。一種解釋這種女性主體的發生邏輯，是將她們的發生，跟新中國建國的社會主義歷史淵源聯繫起來，也就是說，將新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正面特質，例如強調集體性、尊重家國社會、大我重於小我這樣的內涵，當作一種前提，這樣的詮釋進路當然有其歷史生產的合理性，符合這種條件說，

也確實可以選擇性的找出許多的代表作品，例如在新中國建國後的作家早期及 1985 年前的作品裡，就有茹志鵡五〇年代的〈百合花〉、〈靜靜的產院〉，改革開放初期的〈草原上的小路〉，張潔的〈祖母綠〉等，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受過一定的教育，在當時的語境下，算得上是知識女性的一份子，她們在新中國建國下強調的新人主體、兩性平等與崇高獻身的理想主義精神的背景下，勇於對家國社會付出、承擔，不以依附男性求得自我的上昇及發展，她們的行動實踐本身就是一種不外他求的自我完成，跟父權體制及男性的關係也較為平等，不需要仰賴男性的教導與啓蒙，尤有甚者，甚至比男性更為堅毅及有擔當，偶爾還必須在顧及男性的「面子」下，低調婉轉地協助男性的公共任務（例如〈百合花〉中女性協助男性通訊員借被子、〈祖母錄〉中女主人公最終克服個人私情及當年的小我恩怨，願意輔佐軟弱無能的男主人公，共同為國家大事服務），儼然是中國當代社會能夠正面發展的幕後推手。

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知識女性形象，與上段的說明及舉例，共享著共同的社會主義淵源的正面條件，但本文認為，她們的形象特質與內涵的特殊性，主要的生產條件，還要加上，她們位在一個更新的新時期（即七〇年代中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轉折點，以及她們位於農村及農村上層的背景（或說階級）上才能理解。此中代表人物為田潤葉和田曉霞。路遙似乎非常欣賞這一類的知識女性，賦予她們極多不同的新女性主體的特點：整體上來說，她們已經既不同於過去五四時期追求婚姻與個性解放的知識女性，也不同於同期知青作家（路遙和知青世代作家年紀相近，故為同世代）作品中，為抽象理想獻身的上山下鄉的女知青的形象。這種差異性／特質和她們的生產邏輯，可以從以下的一些細節討論來分析：

首先，基於前面已說到的農村及農村上層出身的關係，再加上社會主義正面淵源的條件，路遙賦予了《平凡的世界》中的女知識型主人公（田潤葉和田曉霞）有一種明確地支援弱勢者的立場。反映在作品中，特別是跟底層男性的關係。田潤葉和田曉霞每次出現，總是非常主動地提供給弱勢的農村男性生存、溫飽和精神上的滿足。例如總是帶給男主人公孫少安和孫少平不少食物，甚至金錢上的直接或間接援助，乍看實在很像中國古典小說如李娃傳式的男女關係，當然這也是一種理解的可能性，其哲學基礎乃是建立在某種中國人的民族性，與傳統才子佳人仍有著無法完全割裂的古典

精神結構。但是，路遙書寫這種農村知識女性對男性的主動付出，更具有現代豐富層次的細節和意義，他筆下的農村知識女性在理解此類他者（即底層男性）上，以及對中國鄉土社會的認識上，都有著相當的現實與心理深度，在這裡，由於出身相近的關係，她們比較能夠深刻地掌握到農村底層出身的男性的性格和自尊心的特質，因此並不只是在物質上提供給男性幫助，更多的是在當中提昇、成全與健全男性在精神自尊上的需要。所以與其說她們的美是源於一種普遍性的善，不如說她們的美，是來自於對中國底層困境與自尊關係的本能理解，還有這些女性們在當中所展現出來的手腕與精神力道。（古典小說《紅樓夢》中的女性手腕也極高，但她們的應對對象並不是底層）。例如有一次女主人之一的田潤葉，準備要去見孫少安，路遙這樣展現她的形象：

她現在把衣服也換轉了，換上了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制服罩衣，看起來樸素多了。她知道少安沒有一身像樣的衣服，她的衣服要叫她看起來不拘束才行。她還讓與她關係要好的一個女老師，把她的兩根漂亮的辮子剪成了短帽蓋，只用一根綠毛線扎了一綑頭髮，看起來既樸實又顯得成熟了一些，這使她很滿意。¹²

這上面刻劃的其實就是田潤葉的體貼，把原本太漂亮、招搖的衣服換下，改以另一種樸素的面貌去見孫少安，以降低對男性的壓迫感。而在另一個女主人公田曉霞那邊，她對另一個男主人公孫少平也是既主動付出又一往情深，然而由於雙方身份地位（田曉霞後來成為記者，孫少平是一名礦工）的差異，田曉霞跟孫少平相處的時候，也是相當婉轉細心，深怕儘管出於好心善意，都會影響男主人公強烈的自尊心和其主體的建立，反而會破壞了彼此的感情，她的方法，乃是在自己的獨立中帶入孩子氣，中和掉女性在經濟和身份的位階上高於男性而具有的威脅感，終究讓對方能理解與接受她的用心和感情，這一段田曉霞送棉被給孫少平，相當有代表性：

¹²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91-92。

他看見，麥秸草上的鋪蓋煥然一新。一塊新褥子壓在他的舊褥子上，上面蒙了一塊淡雅的花格子床單；那塊原來的破被子上摺著一床綠底白花的新被子……一切都像童話一般不可思議。……他一下子忘情地撲倒在地鋪上，把臉深深地埋進被子裡，流著淚久久地吸吮著那芬的香味。……很長時間，他才從被子上爬起來；同時在枕頭邊發現了一張二指寬的小紙條。紙條上寫著：不要見怪，不要見外。田。¹³

這種女性的用「心」的方式，在五四講求個性解放、婦女解放的文學小說中，和知青作家作品中的典型形象裡，都很少看見（此處所謂的「典型」，意思指的是在上述代表作中的知識女性的類型），從這個角度上（或在這個脈絡中）來說，路遙選擇了呈現這種階層（農村上層）的女性主體，本身就有取材上的相對特殊性及進步性。

其次，以農村的戀愛、兩性關係的互動，也是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用來呈現農村知識女性主體的一種媒介。路遙在此作中，曾仿古典小說的插入評語的方式，表達他對不發達國家的戀愛與婚姻運作特質的看法，他說：

在中國目前社會裡，很多情況下，感情往往並不是男女結合的主要因素，而常常要受其他因素的制約和支配。也許世界上所有的不發達國家，這種現象尤為普遍。¹⁴

對中國大陸的鄉土社會中的男性來說，儘管他們長期占有家庭與家族的主導地位，但事實上也被賦予更多的承擔生存與發家立業的壓力，《平》作中的背景即是如此：時代已經來到了七〇年代中到八〇年代中，是中國即將走向改革開放與進入改革開放的時期，這個時期開始，中國大陸開始修正過去教條的社會主義路線，重新開放包產到戶與工商經營的自由，換句話說，人們又必須再度回到一種以個人努力奮鬥和資本主

¹³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350。

¹⁴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264。

義運作邏輯的社會意識下發展，這種路線在初階段的實踐中，雖然確實大幅度地改善中國大陸農村與農民的生存狀況，但就長期來說，個人努力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仰賴的仍是一定的資本（就個人來說，也包含一定的聰明才智或美貌等），這種條件預設對底層農村男性的發展其實極為不利，如果他們又沒有機會受到更高的教育（《平凡的世界》中的男主人公即是如此），那麼在殘忍的資本主義體制下，他們的命運，大致多只能在看似平等實則不平等的競爭下，繼續務農或轉工轉商。同時，在社會整體結構還未能發展到技術密集及資本密集的充份條件前，大部份的基本勞力操作又得重新由他們去承擔，這種現象導致農村／底層男性必須讓身體（物質的一種）承擔更大的現實壓力（如果他有責任感的話），也自然會排擠他們生命中某些複雜的精神上的追求。戀愛／愛情是其中之一，因為它會破壞穩定，鄉土社會不能沒有一定的穩定。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的觀點：

在鄉土社會中這種精神（筆者註：費孝通指的是戀愛的激動、不斷的變的浮士德的精神、生命力、活力）是不容存在的。它不需要創造新的社會關係，社會關係是生下來就決定的。它更害怕社會關係的破壞，因為鄉土社會所求的是穩定……男女間的關係必有一種安排，使他們之間不發生激動性的感情。¹⁵

路遙在《平》作中的思考其實非常接近費，因為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內陸（作者筆下的環境位在陝西），相對於快速進入資本主義化、快速富起來、高度接納變化性的上海、北京等大都會，它仍屬於需要較為穩定的鄉土環境，《平》中的男主人公因此也都不太敢談戀愛，因為他們要面對的生存問題已經太過艱辛，世界觀也帶有非常強勢的實用主義傾向，故難以花時間在必然帶有浪漫／無實用性的感情裡，是以老大孫少安對田潤葉的態度才一直很木訥，最終被女方主動告白後，還是決定了放棄兩者繼續交往的可能性，而採取到另一個也很鄉下的地方（山西）找一個身體豐滿，無論在勞

¹⁵ 費孝通《鄉土中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50。

務或性的需求上，都很符合農民期望的農婦妻子，模式仍然是「門當戶對」，某種程度上也比較不會威脅到其自尊心和男性主體；而另一個男主人公老二孫少平，雖然因為曾念過書，也敢於較自然地跟另一個農村知識女性田曉霞在一起，有一些戀愛的細節，但最終路遙也無法推出這種互動模式的現代轉化之道，只好安排讓田曉霞在新聞採訪的過程中，因救人奮勇犧牲而死，孫少平至此也終於能順理成章，跟礦場的另一個需要照顧的寡婦在一起。

相對於《平》中的男性因其鄉土社會的高穩定性，而連動形成的文化人格上的穩定性，推動小說敘事的力量便又回到了女性身上，而在這整套三部曲中，最有張力、發展力的女性仍然是田潤葉。路遙刻畫田潤葉比描寫田曉霞用心，賦予她在中國轉型社會中，因為個人婚姻上的一時錯誤抉擇，而衍生出其它一系列的行動、事件。故事的情節大致是說，田潤葉在向孫少安求愛被拒後，無奈地下嫁給一直愛她的另一名男性李向前。李的心地相當善良，但無論就性格的魄力、心靈的豐富度和事業開展的可能性，都不若孫少安，婚後他雖然不斷努力地想討好田潤葉，希望能獲得她情感和性愛上的回應，但都被田一直無情地拒絕，但李仍選擇繼續善盡他在中國鄉土社會中照顧宗族的責任，對田潤葉家庭仍舊關懷備至，對其弟弟田潤生也力求提攜關照。但也因為感情一直得不到田潤葉的回應，不斷藉酒澆愁，直到有一天發生了車禍，被截斷了雙腿。這時候的田潤葉才真正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感覺李向前的命運，早就是自己的一部分，只是自己一直不能「面對現實」，李向前過去對她的親人的好，才一一又浮現在她的眼界裡。田潤葉似乎是帶著一點彌補與救贖的心理，又與新中國建國後的照顧弱者的文化結合在一起，很理性地面對自己應該也願意承擔的責任，路遙這時候為她塑造的心理狀態是：

她把自己的全部不幸都歸罪於他。平心而論，當年這婚事無論出自何種壓力，最終是她親口答應下來的。如果她當時一口拒絕，他死心以後，這幾年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正是因為她的一念之差，既讓她自己痛苦，也使他備受折磨，最後造成了如此悲慘的結果。她完全能想來，一個人失去雙腿意味著什麼——從此之後，他的一生就被毀了；而細細思量，毀掉這個人的也許正是她！……

「我現在應該去照顧他。」一種油然而生的惻隱之心使她忍不住自言自語說。¹⁶

作者對田潤葉這種成長方式，顯然是欣賞多於可惜。路遙以介入小說虛構敘述，再度採用古典小說常見的評論者的立場，對田潤葉這名女性作出這樣的議論：

潤葉也像換了另外一個人。我們再也看不見她初戀時被少女的激情燒紅的臉龐和閃閃發光的眼睛；而失戀後留在她臉上的蒼白和目光中的憂鬱也消失了。現在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含而不露的成熟的婦女。此刻，我們真不知道該為她惋惜還是該為她欣慰。¹⁷

與此同時，田潤葉連帶著在她的工作本位上，也因此歷練而更加穩重實在。然而，贖罪意識、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理想精神，真的能在一個更新的歷史條件下，保證他們婚姻與感情關係的穩定嗎？類比不同時空條件，但近似的小說結構：勞倫斯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女主人公康妮，也是一剛開始願意照顧因戰爭而導致雙腿殘廢的先生，因為康妮在《查》作中乃是一個從小就見過世面，並擁有無政府主義式教養的女性，世界觀其實非常自由。她對於她殘廢的先生的深情，某種程度上是來自於一種抽象的理想主義與抽象的人道主義精神，爾後，她的先生愈來愈愛跟文人朋友清談，甚至長於善用與消費自己的殘缺，換取社會的資源與外在世界的肯定，遂讓康妮愈來愈對此種「精神」不耐，這才是導致她走向森林／大自然、走向獵人、走向婚外情之路的關鍵。但路遙替田潤葉所塑造這種的女性主體，顯然並沒有走向這一種也有其「合理」性的道路，田潤葉和李向前在中國鄉土社會的感情合理性，在路遙的刻劃中，企圖建構與發展出來的，是男性在虛弱時對「母性」的渴望，以及女性「自覺」地以「母性」作為回應的主體實踐：

¹⁶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384。

¹⁷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385。

李向前睜開眼睛，看見為他揩淚的不是護士而竟然是潤葉的時候，那神態猛然間變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重新得到媽媽的撫愛，閉住自己的眼睛只管讓淚水像溪流似的湧淌。¹⁸

她是妻子，也是保姆。在向前初回家不能自理生活的日子裡，她給他喂飯喂水，端屎端尿，洗臉洗身，還要每天用柔言細語安慰他。每當向前因失去雙腿而一次次陷入絕望的時候，她就像阿姨一樣乖哄他、撫愛他，並且幫助他和自己發生肉體關係，使他重新獲得生活的願望和信心。¹⁹

路遙這種對「母性」之於女性主體的觀點，在《平》作中的農村婦女身上也有展現（容後述）。這種觀點如果從西方的「現代」觀看來，有保守老套之嫌，畢竟從常識上來說，母性本來就是女性本性的一種，但放在《平》中的意義是在於：《平》的世界是一個面向改革開放，力求邁向「中國式」的現代過渡世界，在這種世界裡，女性已經沒有絕對的必要選擇作為一個母親，但路遙讓田潤葉「選擇」成為一個母親，用母者般的行為與心態，來解消她跟李向前之間的矛盾，而不是採用一般更為「平等」的夫妻關係，來面對快速變遷的中國鄉土社會中的婚姻及感情困境，可以說是一種更符合鄉土中國兩性困境的解決模式。

尤有甚者，這種根據實際鄉土現實調整下的女性主體，對其它人的感情世界，也因此同樣具有實事求是的彈性信念，例如田潤葉揣想在什麼情況下，自己與他人可以開展「另外的感情」的可能性時，她的形象與觀點是：

如果她的丈夫是個健康而強大的人，他們感情不和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那麼，她田潤葉也許會尋找另外的感情。——作為生活在眼下時代的青年，儘管她還是個什麼團地委副書記，但她理解別人類似的感情。就不能同意上一代人對此類感情抱有的那種絕對的譴責態度。……她現在對自己的丈夫有一種深厚

¹⁸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386。

¹⁹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202。

的憐愛的感情；不僅有妻子對丈夫的感情，而且還有一種母親對孩子的感情。²⁰

在某些特定或不得已的情況下，「尋找另外的感情」也不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說，這裡的女性主體並不存在著一種本質、教條或泛道德化的內涵。

四、女「身」與母性：《平凡的世界》中的農婦

路遙出身底層農村，對農村姑娘一直有著非常好的印象與感情，從 1982 年的代表作〈人生〉，到此部《平凡的世界》，從未受過教育的農村女主人公，也跟上述的農村知識女性一般，都被作者給予同等的重視。〈人生〉中的巧貞，沒有受過教育，對男主人公總是抱以崇拜及支持的眼光和立場，感情純真且熱烈，雖然在作品中，男主人公最後爲了個人前途，選擇了跟知識女性在一起，但女主人公仍然一往情深地成全，甚至最後男主人公遇難時，也從未有報復的念頭。真誠、善良、對愛情的穩定、專注性高，《平凡的世界》的農村婦女大抵也是以這種形象出發，正如同路遙曾說：

她們知識不多，精神不會太分散，對於兩性之間的感情非常專注，所以這種感情實際上更豐富、更強烈。²¹

這種寫法乍看下來，很接近二〇年代沈從文筆下的少數民族：媚子與豹金那種仍未被所謂「文明」污染前的感情狀態，共同的交集點是未受過教育，做一件事是一件事，談一段感情就是一段感情，而不是某件事或某段感情的世俗功能或效果，例如金錢、地位、權力等。這種敘述邏輯也可以被解讀成具有前衛與現代性的一面，類比來說，1991 年，法國鬼才導演李歐卡霍在《新橋戀人》也採用相同的後設邏輯／框架，不同的僅是以城市邊緣、底層的流浪漢，來取代未受過教育的少數民族或農村／底層的對

²⁰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年），頁 328。

²¹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36。

象。這種邏輯在在顯示：有一種愛情，只有在愈接近一無所有（包括物質、知識、觀念與信念等）時，才愈能夠接近愛情的純粹與排它的性質。然而，這種話語的限制性是在於，意義的來源與哲學基礎，是從形式與抽象化的本質意義而來，完全遮蔽了其它視野／向度——如更具有本土及特殊性問題意識的開展。

從〈人生〉過渡到《平凡的世界》，路遙開始有自覺擴展他筆下農村姑娘的主體意義。能夠侍奉公婆、德性、溫良恭儉讓等農村社會對女性的期待自不用說，路遙在此書中較有現代推進性的形象敘述和觀點之一，乃是特別標舉出農村女性的身體感，例如：

臉雖然不太白，但人樣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身體發育得豐豐滿滿，正是庄稼人所夢想的那種女人。更叫人贊嘆的是，她到少安家的那個破牆爛院裡，沒有顯出一絲的嫌棄，而且第二天就幫助孫玉厚的老婆做上家務活了；還滿嘴奶奶、媽媽、爸爸叫個不停，把孫玉厚一家人都高興亂了。²²

他一見秀蓮的面，就看上了這姑娘。這正是他過去想象過的那種媳婦。她身體好，人樣不錯，看來也還懂事；因為從小沒娘，磨練得門裡門外的活都能幹。尤其是她那豐滿的身體很可少安的心。²³

這當中的女性主體身體感，一者是有能夠勞動的「功能」，二者則是有性慾及其精神上滿足的價值。換句話說，雖然上兩段引文，均採用男主人孫少安的視角來「觀看」女性，而且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女性在這樣的表述中已經被「物化」——作為一種觀看的客體與實在的功能。若從西方女性主義一般的解放立場，這種觀看本身就已經算是一種壓迫，正是需要改革／革命的對象。但作為中國鄉土底層農村的現實卻不一定如此，在這裡，這些未受過教育的農村女性，事實上是心甘情願、非常自然地願意為男性及鄉土社會提供「勞動」及「性」上的價值（其本能之一），以下三則引文可以

²²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219-220。

²³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221。

用來證明：

秀蓮坐在他旁邊，像工作人一樣大方地依偎著他，真誠地說：「沒住處，你先把安排在你們生產隊的飼養室裡」。少安只好嘴苦笑了……。²⁴

蘭花堅決不讓男人去勞動。只要丈夫不再離開她，夜夜摟著她睡覺，這就是她的最大幸福了。²⁵

每天晚上，在他還沒脫衣服前，秀蓮就把一切都收拾好，自己先鑽進了被窩——她要先用自己的體溫把被子暖熱，才讓少安睡進來。秀蓮是個感情熱烈的人，每晚上都非讓少安和她一個被窩裡不行。少安起先不習慣，後來不這樣他倒反而不行了。²⁶

新中國建國後，由於革除封建婚姻包辦、實踐男女平等，農村女性也跟男性一樣可以爭取工作（例如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中寫農村女性有了平等的工作權的快樂形象，即為一種重要的典型），因此秀蓮在這邊，才沒有那種完全沒有工作經驗、應對實事的扭捏形象，當她說自願被安排在「飼養室」裡時，便是她很自然地以理性面對孫少安及其鄉土困窮社會下的選擇。而在第二則引文中，蘭花是小說中的另一個女配角，嫁了一個農村下層看似非常糟的男性，該男子完全沒有任何能夠為家庭營生的能力，但這個農婦蘭花還是無所怨言，儼然是某些文明中的母系社會般的主人，蘭花不但承擔了大部分的工作、理家的責任，在性上也坦然主動，第三則引文中的秀蓮在性上的表述也就更直接，在同樣屬於陝西代表作家陳忠實的《白鹿原》裡，也有許多農村女性在性上是以直接、大膽的狀態出現。我們不能說《平凡的世界》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其筆下的狀態就一定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畢竟歷史事實非常多樣化，本身也是一種建構），但表現未受過教育的農婦在勞動及性上的自主自然地投入，而不是一種

²⁴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222。

²⁵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370。

²⁶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308-309。

西方視野下常容易理解成的被欺壓、待解放的狀態，確實是路遙《平凡的世界》中農婦主體的一大特色。

尤有甚者，儘管孫少安曾經愛過農村知識女性田潤葉，但在他實際地評估兩者之間的物質基礎和責任後，既選擇秀蓮為妻，兩者便以共同交集的勞動，取代純精神交流的愛情及婚姻的互動模式，也仍有另一種不同於本質與精神至上的愛情主義的樂趣，看路遙引文，就充滿著兩人感情的質樸之美與底層男女的纏綿：

入冬以後，夜長了，晚上他們也就不像往常那樣早睡。秀蓮在燈下給他綴補那些破爛衣服，做鞋襪。他蹲在前炕頭上化玉米粒或捻毛線。外面寒風呼呼吼叫，但窩裡暖烘烘的，有一種無法形容的安寧和舒服。兩個人做活中間，由不得相視一笑，傳達著內心無限的情感。她有時會停下手中的活，發呆地傻看他半天。當他捲起一支旱煙的時候，她就又湊過來，像個孩子似的，給他擦火柴點煙。兩個人這時候就幹不成活了，依偎在一起，靜靜地坐在熱炕頭上，好像互相傾聽對方的心跳聲。²⁷

最後，路遙對《平凡的世界》中的農婦主體，跟他筆下的農村知識女性的主體內涵的交會處，乃在於兩者也都帶有「母者」的形象與內涵。然而農婦主體的「母者」，更帶有土地的形象／隱喻，樸素、厚重感、強壯是這種土地隱喻的內涵，男性在這樣的關係中，某種程度上已經自我弱化為小孩，以依附母者、跟隨母者，來獲得慰藉與安全感。以下是這種主體的代表性段落：

就孫少安跟秀蓮的關係：

有孩子以後，秀蓮就更不講究自己的穿戴，經常是一身帶補釘的衣服。少安記得他很小的時候，那時還年輕的母親就是穿著這樣一身綴補釘的衣裳。像土地

²⁷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309。

一樣樸素和深厚的母親啊！想起來就讓人溫暖，讓人鼻根發酸。少安很喜歡妻子這身打扮，他希望自己的兒子也能記住這樣一個母親的形象。²⁸

就蘭花跟其先生的關係：

他突然感到自己脆弱得像個需要大人保護的兒童。在他眼裡，如今身強體壯的蘭花不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親。²⁹

現在，別說那塊地，就是再給她一些地，她都有心勁種哩！只要滿銀在她身邊，她不僅不讓她勞動，還想辦法讓他吃好喝好。家裡好一點的東西她都舍不得吃一口，總是讓男人和娃娃吃。她確實也把男人當娃娃來親——她滿心愛他啊！³⁰他只是在妻子勞動時，中間跑回家給她提一罐喝的，或拿一點吃的。要麼，就給她說些外面的新奇事，說些怪話，或唱一段子信天遊。蘭花高興得都忘了勞累。有時候，這個二流子也轉悠著在附近的地裡撿一點柴火。他就像一只老綿羊，天天跟在妻子身邊。這使我們想起幾年前狗蛋跟他媽出山的情景……。³¹

對農村知識女性田潤葉而言，她的母者之性，是一種用來承擔其丈夫的殘疾／中國鄉土社會現實的一種力量；而就始終都停留在農村的農婦來說，母性則是一種更為天然穩定的關係，慰藉一切也包容一切。夫妻之間的「妻」性，在轉型時期的農村／鄉土中國的女性主體裡，並不是從來沒有，或不願意爭取其「獨立」的可能（例如田潤葉在婚後，很長一段時間，都仍然我行我素地過著單身的生活，而秀蓮也在家業愈來愈穩定後，對很多事也愈展現自己強烈的主張，以至於也引發過衝突），而是她們在參與現實／鄉土中國的艱辛中，逐步地自覺或自然地採用了主動投入、互補的成全之愛，

²⁸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53。

²⁹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370。

³⁰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371。

³¹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371。

來取代在中國歷史社會高度轉型時，難免存在的對立與矛盾（包括男性、中國的鄉土社會關係等）。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她們的女性主體也就不是一種形而上、泛本質化的先驗母愛，是千千萬萬尋常百姓中本土現代性實踐的一部分。

五、結論

總的來說，本文以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形象及女性觀為考察角度，以農村知識女性與農婦的代表，分析她們不同於西方、不同於五四時期，亦不同於新中國建國後上山下鄉的女性主體的流變與特色。

女性主體性作為現代性實踐的一種，在《平凡的世界》中展現了另一條更為貼近土地，實事求是地跟中國鄉土／現實同在的擔當，並以情感的熱烈、明朗與堅強的形象流變，展現了女性在大陸改革開放的歷史社會的巨變中，仍有著母者般的彈性與穩重的氣象——在此作中，這也是她們邁向現代社會中，或自覺或自然的一種實踐與選擇，非傳統意義上的「逆來順受」。因此，在這層意義上，她們克服了過往歷史中突出的女性閨秀、膽怯、感傷、純情及個人主義的自我路線，也不以與男性相對立來彰顯其解放，兩性之間更多的是合乎現實的扶持與互補之愛，是鄉土中國本土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一、路遙文本

1. 路遙《人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
2. 路遙《平凡的世界》（三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
3. 路遙《人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
4. 路遙《路遙精選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5. 路遙《平凡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
6. 路遙《路遙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7. 路遙《匆匆過客》，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2001年。

8. 路遙《路遙文集》（五卷），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年。
9. 路遙等著《絕唱》，（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9年。
10. 路遙《在困難的日子裏》，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
12. 路遙《姐姐》，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1998年。
13. 路遙《當代紀事》，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年。
14. 路遙《小擲槍》，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年。

二、路遙相關重要論著

1. 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著《路遙評傳》，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1997年。
2. 延安大學·路遙研究會編《路遙研究》第一期，2003年4月。（內部參考資料）。
3. 韋建國，李繼凱，暢廣元《陝西作家與世界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4. 延安大學·路遙研究會編《路遙研究》第二期，2006年11月。（內部參考資料）。
5. 馬一夫、厚夫主編《路遙研究》（資料匯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
6. 雷達主編，李文琴編選《路遙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
7. 馬一夫、厚夫、朱學成主編《路遙紀念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
8. 李建軍、刑小利編《路遙評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
9. 閻慧玲《路遙的小說世界》，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年。
10. 李建軍編《路遙十五年祭》，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11. 申曉主編《守望路遙》，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
12. 延安大學·路遙研究會編《路遙研究》第三期，2008年11月。（內部參考資料，為筆型親自訪問延安大學時取得）。
13. 梁穎《三個人的文學風景：多維視鏡下的路遙、陳忠實、賈平凹比較論》，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三、其它論著

1. 費孝通《鄉土中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 年。
2.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The Woman Subjectivity in Lu Yao's *The Common World* : A Reading of Rural Chinese's Indigenous Modernity

Huang, Wen Chien

Lecturer

Abstract

The Novel *The Common World* (a trilogy)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Lu Yao (1949-1992), an important contemporary writer in China Mainland.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and their world view, the female peasant intellectuals and woman peasant as expressed in *The Common World*. It i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peasant women and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ern,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ra, o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woman subjectivity as a practice of modernity expressed in *The Common World* shows that they are faithful to the rural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make changes as a peasant mother. They have overcoming the timidity and sentimental emotional of women of the chambers. These peasant women or intellectuals do not challenge the men in order to liberate themselves. In their struggle for their identity, they respect both sexes by showing with help and love. This is the true practice of indigenous modernity in rural China.

Keywords: Lu Yao, *The Common World*, woman, rural China, realism.